

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深刻地反思和批判

——丁帆先生访谈录

王理行 丁帆



【摘要】 在本访谈录中,丁帆先生提出应构建有整个人类视野的“全景式文史哲坐标系”,强调知识分子的职责在于深刻地反思和批判。他还论述了如何把外国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理论融入中国文学研究,如何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角度重新考虑“当代性”的内涵和外延,提倡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介入和在场主义,并就 AI 对知识分子的功能和价值观的冲击下人类独有的创造力和智慧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全景式文史哲坐标系;知识分子;当代性;AI

王理行:丁帆先生,在你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跨学科是一个明显的特征,且总是体现世界文学的眼光,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展开论述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特征与世界文学的视野,自然是在你长期广泛阅读世界各国人文学科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养成的。我想请教丁先生,你是如何读书的?

丁帆:我想从学术和学理的层面谈一点治学体会。

作为人文知识分子,读书要杂。我们搞文学的人,应该打通历史和哲学,虽不能说是通古博今,起码对相近学科的基本常识和基本史实要有所了解。尤其是当下,在剔除大量“伪史”的基础上寻觅“真史”,才能找到读书的历史脉络和方向。前些天,和史学界朋友聊天时谈到,近代史研究中,有些所谓的学者,居然罔顾史实,为某个反人性、反人类的历史运动张目鼓吹,让人大跌眼镜。这些人不是不知道史实,而是价值取向出了问题。面对这种见风使舵的价值观,就需要你从大量的史实真相当中去寻找价值的真理——那就是在哲学的海洋中找到照亮前行的航向,我把这种方法叫作“构建文史哲共同坐标系”。一个失去参照物的学术研究,就是平面研究,是没有坐标、不成体系的学术研究,即便挖掘得很深,也是无法“打出世界去”的(鲁迅《致陈烟桥》)。我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所说的“文史哲共同坐标系”,不仅指中国的文史哲,更要从中国的文史哲视角出发,扩散到对世界,尤其是欧美的文史哲坐标的观照,最终构建起有整个人类视野的“全景式文史哲坐标系”,

如果有兴趣的话,还要将它再延展到美学、社会学、心理学、生态学、绘画、摄影、风景、建筑、音乐等跨学科领域,它们就如同围绕在太阳周围的行星一样。这样的坐标系才会创造出群星璀璨、丰富多彩的文本世界和文本分析世界。

我这一辈子最遗憾的就是不能用外语阅读原著,只能靠翻译过来的“二手货”去理解与阐释原著精神,尽管我父亲在辅仁大学读过书,尽管我太太是英语系出身,还曾经几番劝我通晓英文,但我没有遵循他们的意见,后悔晚矣。在我接触的大量外语系朋友中,直接介入当下中外文学作家作品和文学动态的学者并不多。大多数人都沉浸在工具性的翻译工作以及教材的编写工作中,远离当下世界的人文语境。就像我太太,她主编了7本“十二五”“十三五”国家成人英语规划教材,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但她放弃了文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件事让我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太太和她的老师任大雄先生(曾与乔冠华一起参加板门店谈判并担任翻译的老教授,晚年去了安徽师范大学),还有一位同事(现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一起翻译一本《外国现代派文学》,请我负责润色。我通读译稿后发现,他们各自都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即对书中涉及的国际文化背景和文学背景、文学理论思潮背景并不是很了解,这样,理解作家作品时,往往就会有“误读”和“误译”的现象。也许这就是不同学业背景的译者翻译同一作品时差异很大的原因。我在解读翻译作品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我的好朋友陈众议与董燕生、林一安就杨绛《堂吉珂德》译本中“胸口长毛”的争论,就触发我对这100年前“直译”“硬译”和“意译”讨论的思考,这实质上就是翻译过程中文学性和工具性如何兼顾的问题。我用一个外行的眼光参与外语翻译界的讨论,只是一孔之见而已。

这些事,让我受到了切身的震动和启迪。自那时起,此我开始大量阅读“二手货”的外国文学理论、思潮、现象和作品,试图将其与我的专业进行对接。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因为大量的西方文学理论、思潮、流派、现象和作家作品涌入了中国,批评家也好,作家也好,从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当然也包括一些“垃圾食品”。欧美文学200多年来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就像放电影一样在中国文坛漫溢流淌。回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我们都是亲历者,讲句大实话,正是从80年代多样性的选择中,我们的文学才从“苏联文学模式”的局限中走了出来,有了更多的参照物,具备了分辨作品优劣的能力。因为我们几十年来并没有吃过更好的文学食物,尤其是十年内乱时期,文学参照系有所缺失。我也正是在那些特殊时期,以“抢”和“偷”的方式,读到了这些不一样的作品,《牛虻》就是其中最薄的一部长篇小说。

所以,那时的我并不认为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最优秀的作品,但是,苏联情结根植在中国几代读者的心中。那年余一中先生批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请我“炮火支援”,我第二天就写了《怎样确定历史的和美学的坐标——重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札记》(发表在《文艺争鸣》2000年第5期),之所以能写这篇札记,正因为我对此书的整个文化和文学背景有着深刻的了解。

当伏特加成为几代中国读者心中贵族酒的象征时,北京的“老莫餐厅”就成了一个特殊人群聚集的贵族交际场。当王朔的《动物凶猛》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时,那里又成了这一特殊人群当年狂欢的历史背景板,尽管我后来十分敬佩王朔。

我也不怕得罪当今中国的一流作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通过对欧美、拉美文学的“仿写”,跳出了“苏式”写作的框架。谁先跳出来,谁就占得先机,成名就越早。当然,军功章上的功劳也有翻译家的一半,即便是翻译错了,垃圾吃下去也会化作营养,因为当年大家都是一群饿狼,消化能力极强,而且“误读”一词也是当年的时髦词。90年代中期,我在《读书》杂志上读到了张隆溪先生的一篇文章,驳斥国内一些翻译家对萨义德著作《知识分子》原意的误读和误译,这些翻译家竟然将萨义德的原意弄反了,这让我十分震惊,陷入了沉思。

王理行:看来,在你构想的“全景式文史哲坐标系”中,欧美的文史哲乃至整个人文领域的杰作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我还注意到,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反思贯穿于你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中。你还曾经写过一系列反思知识分子的文章。请你谈谈这种反思的初衷。

丁帆:刚刚提到的张隆溪批评萨义德《知识分子》误读和误译的文章,触发了我开始有意识地对知识分子进行反思,尤其开始反思100年来中国从政治到文化,再到文学,为什么总是受到俄苏文化和文学的影响,却对真正有价值的世界文学常常熟视无睹。

大量的原始资料让我惊讶我们的无知。尤其是苏联史料解密后,当我读到沈志华用自己一生积累下来的钱去俄国购买这些资料并写成书时,我才从中理解了许多“为什么”。对于从孙中山、蒋介石到陈独秀(我有文章专门提到陈独秀晚年对俄苏政治文化的反思问题)、瞿秋白(我今年特地发表了一篇散文《在瞿秋白墓前的遐思》,意在剖析一个文青是怎样受俄苏文学影响逐步成为政治领袖的心路历程,并为知识分子“多余的话”一辩)等人的所作所为,我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许多历史事件的细节中才能看清文学的来龙去脉。所以3年前,我曾提议将那部朝鲜战争的史书评为“思勉奖”的第一名。

我阅读了出生于沙俄时代的英国著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大量著作后,在2012年《读书》杂志上开创了一个连载4期(4万多字)的专栏,专谈俄苏时期“白银时代”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下的思考与写作,因为我要“寻觅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坐标系。后来,这些文章加上我撰写的许多阅读国外知识分子书籍的文章,结集为《知识分子的幽灵》一书,此书上了腾讯2017年10月好书榜,本来还有可能上年度好书

榜的。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没有一个“知识阶层”。

我想说的是,我的《知识分子的幽灵》是以探寻苏联时期知识分子的良知为线索的,正因为有了这批人,才涌现出 5 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和 1934 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后的“两截人”,包括高尔基,有所不同,他们坚持着人性的立场。无论在国外还是在苏联国内,他们都是人性写作的典范。其实,“诺奖”的重要标志正是以人类的共同人性作为评判标准。

苏联时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包括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搜寻百度,这些名字依然赫然在列:

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1933 年凭借小说《米佳的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俄罗斯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蒲宁的作品以“诗化”的特征著称,强调探究细微的感情与展现真实的人性。

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958 年因《日瓦戈医生》获奖。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还深刻反映了苏联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多面性。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65 年因《静静的顿河》获奖。这部作品描绘了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壮阔历史,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黑暗。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70 年因《古拉格群岛》和《癌症房》获奖。索尔仁尼琴以揭露苏联集中营系统闻名,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人性的坚韧与社会的残酷。

约瑟夫·布罗茨基:1987 年因《诗选》和《悼念约翰·邓》等作品获奖。布罗茨基的作品以深刻的哲学思考和对人类境遇的敏锐洞察著称。

百度资料的叙述中,这些作家都是因为某一两部作品获诺奖的,但实际上,“诺奖”是奖给作家的,也可以说是奖给作家的总体创作的,相当于作家的终身成就奖。获奖原因中会提到作家的一两部或两三部代表作,但并不是将奖项单独授予某一两部作品的。这些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不仅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对苏联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是指,无论是在苏联国内还是国外,那个有血有肉有骨的群体在斯大林时期依然存在着,因为人性和良知尚存。

前天,我收到了高红斧评论《知识分子的幽灵》的文章,让我十分感动,觉得找到了知音。他以为:

《知识分子的幽灵》,是丁帆先生关于数位近现代思想者的读书笔记。

通过解析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苏联的心灵》《俄国思想家》、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博维《权力中的知识分子》、凯里《知识分子与大众》、阿伦特《论革命》等理论著作,以及纳博科夫、高尔基、梭罗等作家的作品,审视这些域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光芒及实践推力,在历史与现实、古今与中外的坐标系中,探讨知识分子这一复杂阶层的思想生态、社会影响和历史祛魅。显然,本书是丁帆先生“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立意在反思中国的启蒙,指归在呼吁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义务。在《知识分子的幽灵》序言中,丁帆先生指出:“更可怕的却是封建主义的幽灵在那些所谓的启蒙主义者身上附体!……五四启蒙的溃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尚未完成,就俨然去启蒙大众,所以才导致了启蒙始终行走在忽‘左’忽‘右’的歧路上”,再次强调其一贯的学术立场,彻底揭露中国知识分子启蒙者的文化惰性、尚未完成自我启蒙的历史真相,“对照世界思想史的进程,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现代哲学和思想是那样的苍白与空洞”。也就是说,在丁帆先生的学术眼光中,中国启蒙者尚未完成自我启蒙是历时的。因此,他呼唤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勇于承担使命与义务,即“那种近乎宗教式的、毫无利益可言的人性立场,是其传道授业的根本,它是一项要完全剔除权力诱惑下的利益驱使的、出自自身需要的、植根在每个人无意识之中的神圣事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的职责就是深刻地反思和批判,这才是他们存在的意义。”

这段话算是准确地表达了我写此书的初衷。

王理行:你此前强调,作为人文知识分子,读书要杂。据我观察,你看书确实很杂,而且阅读量极大。比如,你身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所阅读的外国文学和文学理论名著的数量超出了多数外文系的师生,并对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评论。比如,对于早已被国际文坛遗忘的英国小说《牛虻》,你曾反复阅读研究,并做出仅凭一部《牛虻》,其作者伏尼契就有资格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结论。你是如何把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融入中国文学研究的?

丁帆:《牛虻》这本书虽然很薄,但却是外国文学中给我启发最大的作品之一。《拯救与反叛——重读〈牛虻〉》一文写了2万多字,主要是谈我们曾被苏联文学理论带偏了对《牛虻》的阅读与阐释,主张重新从人性的角度去发掘和剖析历史和审美的内涵。

还有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中国阐释的演变》(上、中、下)近5万字的系列论文,旨在阐释苏联文艺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问题,虽然是戴着镣铐跳舞,却也会让明眼的读者看出我的用意。其中第三篇(下),被我拖了近两年,编辑

来催稿,说读者问为什么还不出来。他们怎么会知道其中的艰辛?我要怎样才能让人看得懂我文字背后所要表达的思想呢?这是最难的事情。

至于我为什么会阅读大量的心理学、社会学,尤其是艺术学的著作。除了兴趣和爱好,就是想为自己的坐标系里多增添几颗“小行星”,开拓疆域,也就是开拓视野,为我的专业研究多开一个“比较参照物”的通道。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我做第一批国家社科青年项目《中国乡土小说史论》时,提出了“三画”理论(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便深受艺术学的影响。后来,我阅读大量的西方艺术学理论著作,比如《剑桥艺术史》、“牛津艺术史”丛书、“克拉克艺术史文集”丛书等,以及数十本世界各大博物馆馆藏丛书,更不用说中国绘画和书法理论丛书了。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最早的启蒙读本就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

我的书架上,这类艺术书籍不下千本,这些都是“桥接”我思想灵魂的有价值的著作。我写下了许多学术随笔和札记,包括许多散文,像今年出版的《消逝的风景》,我并不是在写单纯的风景,而是在写风景背后的历史和哲学。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寻找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对接的驱动力》,其中谈到的就是“输出”和“输入”的问题,以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能见度”问题。得出的结论是:“闭门造车当然是不行的。‘中国状态’‘中国故事’书写的产生一定是要有参照的,缺乏参照系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半盲状态’的写作。如何在题材、内容、形式和技巧层面与世界文学对接?那就是要从与别国的文学鉴别中汲取、消化和提取各国的文学长处,由此来确定中国文学的坐标定位,这可能就是‘原创性’作品区别当下作品任意性写作的去弊效应,这才是原创性作品的灵魂所在!唯有此,才会有超越地域、民族和国别的资本。没有这样的眼力和魄力,你的作品也只能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渠道重新回流到国内来,投喂到广大的阅读群中,放在读者的检测线上进行二次检测。”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始终萦绕在我们的认知中,今年残雪落选才是正常的,得了反而是不正常的。

王理行:你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无论是针对具体作品还是文学理论思潮,都直接面向中国文坛,体现出很强的介入性。你一直强调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在场主义”,一直积极从事当代文学批评,也对文坛的一些现象发表过独到的见解。近年来,面对当下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的新现实,你一直在重新思考“当代性”内涵和外延的建构,请你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丁帆:“在场主义”就是作家在创作时,必须坚守灵魂在场、价值观念在场以及思想批判性在场。我是秉持共和国文学应该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立场的。“在场主义”应该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补缺,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缺少这样的元素,即便是在人类的大灾难面前,能用非虚构文字记载史实者,也是凤毛麟角的。正如我所说的:“在人类当下的苦难中,我们的作家关闭了自己的心灵良知,不敢触动人性的底线。”

2020年后,我在一次关于阐释学的讨论会上进行发言,谈到了如何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角度建构“当代性”的阐释理论问题。

谁也没有预料到,2020年整个世界会遭遇如此巨大的人类灾难,以及这一灾难所带来的人类意识形态的剧烈动荡和分裂。所以,重新考虑“当代性”内涵和外延的建构,让阐释学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当下文学批评,使其既具普适性,又贴合中国国情,应该成为我们重新厘定与思考“当代性”价值理念的前提,也是我们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批评与阐释体系的归宿。

我们无法用一个自洽性的理论去阐释现实世界的突变现象,人类正面临无法从以往的文化理论中寻找分裂现实阐释的困境。各种意识形态的背离与抵牾,让人类从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找不到归属感,友情、亲情和爱情可以在一个相悖的观点中分崩离析、土崩瓦解。鉴于此,我以为,在人类这场浩劫之中,可怕的并不是瘟疫本身,而是瘟疫流行中和流行后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巨大裂痕。如何解决人类这个灾难的文化命题,应该是所有文学创作者和阐释者都需积极参与讨论的问题,而如何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角度去建构“当代性”的阐释理论,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以我们惯常的学科分类思维来说,人们似乎把即时性的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归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范畴,而将阐释学归为正宗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学科范畴。我以为,这样的隔离带,或曰“防火墙”,反而会将鲜活的文学批评引入缺乏理论支撑的感性的泥淖中,进而失却哲思的力量;相反,倘若阐释学仅仅成为一种空悬着的理论模式,而不能积极地参与当下的文学活动,具体指导和实践文学文本的解析,那么不能进入实验现场的“阐释学”就是一台废弃的机器而已。以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新批评”流派为例,他们之中既有诗人、作家,也有理论家,更有一批颠覆旧“阐释学”的批评家,其中的主力军多为诗人和作家。由此看来,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融合并非不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生产机制,恰恰相反,一旦2种思维在某一个时空维度上交汇,对文学艺术产生的冲击力将是巨大的,同时影响着当下文学批评和阐释学的运用。当我们俯视当下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时,我们的视野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也就不会在既无哲思又无实践的文学怪圈“鬼打墙”中迷失方向了。

由此说来,从逻辑上分析,批评与阐释并非种属关系;但完全用一种并列关系来看待,似乎也不合适;它们之间应该是既有递进关系,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文关系。我们无法将其加以严格区别开来,也许有

一种理论可以举证出许许多多的范例来支撑批评与阐释是两个不同的理论范畴,但是,就我浅薄的目力与学识所见,窃以为,批评与阐释完全可以“合二为一”,演变成为一种当下文学批评的新“文体”,让它们成为一种对当下文学批评有效而不可分离的新文体,更高能地发挥文学艺术批评和文学艺术评论“无限阐释”的可能性。也许,我所说的“有限阐释”和“无限阐释”与张江先生所阐释的此中义理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本位考虑,我是站在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的实用性角度而提出问题的,只要能够放大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的功能性,我是愿意去进行这样嫁接文体的阐释实验的,让它成为进入当下文学现场的“中介批评阐释文体”,而这是否能激活我们的文学批评的繁荣呢?

20 世纪以来,随着“新批评”的崛起,旧式“古典阐释学”被颠覆反转以后,批评与阐释就更加融为一体了,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批评即阐释,但它们确是一对孪生兄弟,其内在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

那么,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当下的批评与阐释亟待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限于时间和篇幅,我仅随机提出几个假想的问题。

1. 批评与阐释必须在明白易懂的语言表述下才能进入接受美学的语境。我们不能用“名词轰炸”去吓唬人。回顾历史,这个当下文学批评的“后遗症”正是 20 世纪 80 年代留下来的理论遗产,这是当时我们在接近 200 年来西方文学理论时,从大量的翻译文本中寻觅到“新名词”(哪怕是错译的词语)后狂轰滥炸的后果,甚至是在囫圇吞枣后由个人杜撰“新名词”的结果。我们不能不说,当时的理论“新名词”口号时尚给沉闷的批评界带来的激情和兴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批评的繁荣。如今回想起来,即便是虚胖的繁荣,也是有利于文坛朝着进步发展的。但是,三四十年过去了,如果这种批评与阐释文风仍然不改变的话,我们就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和阐释学的理论体系。所以,我首先感知的是,我们不能只提出概念与口号,一定要在一个宽松和谐的学术环境中展开“百家争鸣”的辩论,才能使我们的批评与阐释迈向新境界。

就文风而言,我们既要打破“学院派”高头讲章式的批评与阐释文风,也要摒弃没有哲思的纯粹“印象派”文风,只有二者有机地结合,才能使我们的当下的文学批评和阐释进入一个高屋建瓴的有序程序之中。

2. 批评与阐释应该追求个人的“艺术趣味”和“审美情趣”。我一直认为,作为文学艺术的批评和阐释,如果对自己批评与阐释的文本对象都没有丝毫的艺术感觉,那么你就无法真正进入文本的批评与阐释之中,也就不能切中要害地做出准确的艺术判断。批评与阐释也是需要调动主体的

艺术情趣和才华的,唯此,我们才能立足于吸引专家和大众的阅读和接受。这正是中国百年来批评与阐释稀缺的艺术元素。

3. 反之,“批评”与“阐释”的本质在于它是建立在哲学层面上对文学的审视。一个缺乏哲学思考与理论建构的文本与图像艺术分析、阐释,应该不属于真正的学术批评与阐释。然而,那些只凭借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寻章觅句后,对文本和图像做出拾人牙慧的演说和图解者,其批评和阐释属于缺乏建构的“中介性”批评与阐释;而那些只在西方文论关键词里抽取理论条文进行放大夸张铺陈者(这也是我一直在自我反省的重大问题),缺少的是在大量的理论比照阅读当中,建构起一个属于在此基础上升华的自洽性新理论,从而解决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和阐释中的诸多实际问题。所谓创新,就是需要我们的批评与阐释者用哲学思考的角度去看待文本的内涵,这就是文本批评与阐释的“第三只眼”。没有哲学的支撑,我们的批评与阐释一定是流于肤浅的,是一种千篇一律式的模式化解读。当然,这种哲思的介入,既要让专家理解,也要为大众阅读所接受。而我们目前所需要的则是一个宽松的“百家争鸣”的理论辩论语境,要想将批评与阐释走向一个更加深层的学术境界,没有广泛的学术辩论、切磋是难以深入下去的,也就无法实现创新和重新建构新的批评与阐释理论体系的可能性。

在此,我希望的是,我们的理论家们更多地参与当下文学批评和阐释,消除那些学科间的偏见和壁垒,正如韦勒克所言:“学院派人士不愿评估当代作家,通常是因为他们缺乏洞察力或胆怯。他们宣称要等待‘时间的评判’,殊不知时间的评判不过也是其他批评家和读者——包括其他教授——的评判而已。”窃以为,只有当从事文学理论的学者放下身段,从艺术情趣的角度去介入当下文学艺术的批评与阐释,我们的文学艺术批评才能热闹起来,才能从诸多的实践活动中找到具有规律性的理论,从而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批评和阐释的理论体系来。

4. 消除唯作家论说为批评与阐释中心的针对低端文本图像的艺术解析,是当下批评与阐释的一项重要任务。显而易见,这种批评来自中外古典阐释学的范式,并深深影响了中国百年文学批评与阐释。只有当批评摆脱了作家给定的阐释内涵范畴,同时不受某种指令性的意识形态控制,才能在独立自由的语境中进行公允的批评和合理的阐释。否则,我们就无法完成当下文学艺术批评与阐释的创新。

5. 批评的属性是用真理公允地阐释文本,使其朝着人类精神健康发展的道路前行。这虽然只是一个常识,但却是一个由不同价值观的批评家掌控的文学艺术阐释学的要害问题。谁来发言、如何发言,才是批评与

阐释的关键所在。我们希望的是,中国当下文学艺术批评不要总是在违反常识的基础上展开有限和无限的“伪批评”与“伪阐释”。

王理行:那么,如何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角度去建构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当代性”价值理念呢?当“当代性”具体落实到对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阐释时,应该注意哪些实际问题?

丁帆:这些年,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是,面对整个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十分紊乱的“后工业”和“后经济”的战争时代,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什么。

国际和国内的特殊背景迫使我们当下反映现实题材的文本进行一种“当代性”的思考。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已经在5年前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第七期发表了《现代性的延展与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建构》一文,其中许多参考文献来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西方文论关键词》。

6年前,我在开始撰写关于“当代性”观念进入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语境时所遇到的瓶颈问题,并没有预料到2020年会发生如此巨大的人类灾难,当然也不会预料到这场灾难所带来的人类意识形态的剧烈动荡。如今重新考虑“当代性”内涵和外延的建构,目的就是再次警示我在30年前就提出来的知识分子的“二次启蒙”问题。

西方所提出的“当代性”概念与中国语境下的“当代性”概念既有共通性,亦有差异性。但是,经过2020年全球范围的疫情大传播,人类的意识形态(包括东西方)都发生了巨大的紊乱、逆转和碰撞。原来从单一到多元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叙述交流话语,面对目前紊乱复杂甚至连理论家都无法用自洽性理论去阐释的现实世界突变现象,显得无力且令人惊讶不已。人类正面临无法从以往的文化理论中找到对现实世界的满意答案。因此,所有人文学者都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如何解决人类这个灾难的文化命题,而如何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角度去建构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当代性”价值理念,是当下值得思考的重大学术问题。

当然,我所说的“当代性”,就是指中国百年来所使用的“现代性”在“未完成的现代性”的进程中,发生了突变和不适应性——起码它在各个领域人类的意识形态中已经不能包容、囊括、覆盖其所指与能指的现象的外延和内涵了。所以,修正和弥补这个概念的不足是个大问题,而具体落实到“当代性”对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阐释上,我觉得应该注意的是以下几个实际问题。

第一,“当代性”对文本的阐释必须基于具体文本分析。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阐释学,其对象是当代“正在进行时”的新鲜出笼的文学文本,需进行在场的文本阐释,具有特殊性的要求。它不是空洞的“能指”和“所指”,不能停留在空洞与空泛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圈套阐释中。它必须是对文本“及物性”的阐释,既要作家意识到的主题与艺术技巧进行理性提升,也要对作家没有意识到的主题与艺术技巧

进行弥补和发掘。

第二,“活的生活和活的语言”以及活的形象思维分析,必须进入现当代文学文本阐释的渠道。当代文学的批评与阐释不能离开“文学性”的表述。它不能像理论家那样沉湎于纯理论的逻辑思辨推衍,它的逻辑推理必须建立在“文学性”表达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语言层面,你得使用文学性的语言进行表达。在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中,须得首先沉浸在形象思维的语境中,尽量避免使用设定的抽象概念去剖析作品中的故事描写和人物性格,而是根据自身从现实生活中取得的生活经验和从各种各样渠道获得的知识经验,用生活化的语言对其进行描写,让理性的结论在接地气的文学性分析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它倡导的是“活的生活和活的语言”,让“活的理论”在水到渠成中自然流淌出来。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当下活的文学批评与阐释。

第三,如何在二次经典化过程中对文学史文本进行重新阐释?以上所说阐释方法同样适用于对在百年文学史中已经沉淀并凝固了的作家作品的分析。回到历史的现场,用鲜活的语言和形象思维的分析重新激活历史中的“化石”,这也是我们重写文学史,进行二次经典化文本阐释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四,如何面对已有的文学史料,使其在文学史的重构中更新复苏?百年文学史史料的处理应该是我们学科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如何运用史料,让有用的史料进入文学史阐释的核心位置,而不是把一堆垃圾塞进文学史当中,这在当代文学史的史料运用中尤其突出。如何去激活它内存中可以再生的细胞,让其在文学史阐释的序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遴选者的眼光固然重要,但是,其方法的运用同样关键。要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能够改写文学史的激活细胞,就必须寻觅那种能够还原历史现场、撬动改写文学史杠杆的生动细胞,这仍然需要我们对具体的文本(囊括文学创作文本、文学批评文本,以及文学思潮、文学形象、文学运动等历史文本)进行重新审视和阐释,当然仍然需要我们用文学性的表达抵达历史的真实境界。

王理行:你强调的批评与阐释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和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建构很有启发性。从传统上来说,知识分子的核心功能是通过思考、分析和批判性反思来推动知识的创新和传承。然而,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进步,AI 在某些领域已能超越人类的认知和处理能力。例如,创作、艺术、伦理等领域原本被认为是人类的专属领域,但 AI 的出现使得这些领域的界限变得模糊。这促使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并不得不思考:什么才是人类独有的创造力和智慧? AI 对知识分子的功能和价值观的冲击是巨大的。面对这样一个人类难题,更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困境,你有什么看法?

丁帆:AI 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了。我想,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人工翻译了。那么,“我们到哪里去”这一哲学命题就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意义及存在价值。

这个问题才是真正涉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哈姆雷特之问,同时也是对你上一个提问的延展。因为共同命运要依靠理论来支撑,然而,无论是中国古代文论还是中国现代文论,都无法建构体系性的理论,因为中国文论从哲学的逻辑层面来说,是鲜有体系建构的。我们只能像芯片制造那样,依靠有理论体系的外国文论的模型,来建构新的当代性体系,取精用宏,从一个点上进行突破,最终形成自身再造体系。所以,这 20 年来,我都要求自己的博士生一定要了解西方文论的历史和现代进行时,把现有《西方文论关键词》作为必读书目,在了解其轮廓后,寻找相应的学术领域,进行深度研究。

去年 11 月 11 日下午,我在北大中文系“科技文明的时代,传统文学何为?”的对谈中,做了一个简短的提纲性式即兴发言,名曰“四面楚歌的学科发展”。本来自己对这个主题并不感兴趣,但 10 日晚上网上的 2 条新闻让身处北京大学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我重新思考:一个是澎湃新闻报道的在“立马九衢春影中——中国古代文学八〇后学人论坛”揭幕式上,陈尚君先生引用《国际歌》“让思想冲破牢笼”和曹旭先生用“掀起你的盖头来”的歌词为题,表达了他们对学科发展的愿望,但我以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似乎事与愿违;另一个则是看到了即将上市的 AI Pin 将要取代人工智能手机,为人机接口拉开了人类未来文明和文化生存方式的序幕,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双刃剑时代,开启了“人”与“虚拟人”“非人”的大战。

次日回到南京,晚间看到即将在苏州召开的由《探索与争鸣》期刊和苏州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一百年与二十年:思想史视野下的百年中国文学”高端论坛群里,几位先生也注意到了那场古典文学的“八〇后学人论坛”“博物馆化的学术研究”的趋势,道出其与时代脱节的研究方法,而这正是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毋庸置疑,反思自身学科的现状,应该成为当前各个学科的当务之急。百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人文学科学术研究脱离现实社会、无视社会发展大变局的种种乱象与困惑,我们失却了人文价值的判断,其思辨能力、哲学批判能力几乎丧失殆尽,呈断崖式的坠落。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规避这一现实,将是一代学者的遗憾。

因此,我站在五四新文化传统的坐标上,阐释本学科所面临着的百年不遇大变局中“四面楚歌”的境遇,以期引发其 4 个子课题的思考。

从百年中国新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所谓“四面楚歌”让我瞻前顾后、左顾右盼,这 4 个方向分为前后左右,其前后是外部文化大背景,其左右则是内部学科生态现实状况。涉及的领域是中国传统、古代文化和文学、现代文学、文艺学和外国文学,这些领域都存在着前现代的“知识考古”学风,其他学科亦然,它们都在为现时的政治文化制度服务,存在着左右思想的矛盾冲突。而另一个怪兽已经悄悄地进村了,

许多人还沉睡在温柔乡的美梦里——AI之剑正悬在我们的头顶。

所以,我现在谈这个问题,是想以严峻的事实预警人类:AI取代人工,导致大量工人、军人及知识分子失业的局面即将来临。一个国家的强大,在于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那么,人文知识分子会不会大量失业呢?我以为,这是有可能的,那些仅限于工具型教学的教书匠将面临危机,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是那些能够创造思想的知识分子。

这就是以AI为核心的智能文化的“绞肉机”,它不断引领文明走向未来社会的新路径,却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把双刃剑:既给人类文明和文化带来前所未有的革命性知识储备与生存质量提升,又在文化领域里搅乱文明发展的合情合理性。于是,“人”与“非人”的战争序幕拉开了。20年前,我在《随笔》上写过一篇南大哲学系林德宏教授《人与机器——高科技的本质与人文精神的复兴》的书评文章,因为当时美国在一个黑人脑子里植入了电脑芯片,手术进行了8个小时。芯片装进去以后,他就可以将大数据储存的很多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瞬间掌握数十种语言,12吨的资料输入他大脑,他能回答很多你不知道的问题。我当时就想,这若能省去人类的学习过程,岂不是可以省略掉十几年的寒窗苦读了吗?学习过程的省略为人类节约了多少年的时间成本啊。但我又提出来一个疑问:机器能替代人的思想吗?当时我的题目就是一个问号。而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正是人机接口时代开启的前夜吗?我看到一条消息,某公司推出了一款叫作AI Pin的可穿戴设备,它是一个微小的激光投影仪,就戴着这样一个小方块,你的一切日常生活和知识需求,都可以通过你的口述,立马在手掌心投影指示完成。它是智能手机的更新迭代,我想这不就是人机接口吗?人机接口时代的序幕,无须用外科手术把芯片植入大脑,然而,这个过渡带来的负面影响又是什么呢?我之所以把它称为人类文明的一把双刃剑,是因为它虽然给人类文明进步带来了非常便利的生存与生活捷径,但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它代替了人的思考将会产生什么?它出错了怎么办?我看到过一则报道,AI操作的时候,竟然把一个工人压死了,酿成了恐怖事件。ChatGPT是不是能够回答人类所有的问题?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是模式化、程序化的,没有独特的人脑创新思考能力,所以回答问题都是模式化的,它从大数据里面提取了很多它认为是正确的答案来回答你,但这是人类独立思考的问题吗?所以,我们在“四面楚歌”中面临的重大危机,就是智能时代的后信息文化对我们的压迫。也许世界古典文学无须思考这个问题,但当代文学必须对此进行深思。

以上是前后两翼的问题,是我们学科的外部环境问题,而我们内部环境存在的就是左与右的问题。内部环境的问题就是我们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百年来启蒙失败所遇到的2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一左一右两种思潮的博弈一直纠缠在我们的文学研究和创作中。

面对现在的机器和人,文学的核心是什么?我以前把文学核心中的审美、历

史、人性这 3 个元素视为文学的重要元素,这个次序我现在颠倒过来了:文学首先是人性的,然后才是历史的和审美的。人性元素是文学永远不变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也是面对向后看的结论。无论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人性和人道主义都是不可替代的,除非地球毁灭,因为人永远是“单数”的,而机器和意识形态永远都是“复数”的。所以,我说的瞻前顾后,向后看,现代文明的发展,从工业文明到后工业文明,再到后现代文明,它就是一个“人”与“非人”的文化博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站在人文学者的角度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在 20 年前的文章里就回答了:人的思想和思考是不可替代的,不可强制的!文明再进步、机器再发达、智能再先进,也无法替代人的思想和人的思考。然而,AI 真的会改变人类吗?这个疑问将是意识形态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2024 年 10 月于南京大学和园桂山下)

The Duty of Intellectuals is to Reflect and Criticize Profoundly:

An Interview with Mr. Ding Fan

WANG Lixing DING Fan

Abstract: In this interview, Mr. Ding Fan proposes to construct a “panoramic coordinate system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ole human race, emphasizes that the duty of intellectuals is to reflect and criticize profoundly, discusses how to integrate foreign literatur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consider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contemporaneity” in the perspectives of literary creatio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history, advocates the intervention and presenceism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studies, and expresses his own views on the unique creativity and wisdom of human beings in the face of the impact of AI on the functions and values of intellectuals.

Keywords: panoramic coordinate system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intellectuals; contemporaneity; AI

作者简介:

王理行,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外文学、文学翻译、编辑出版研究。

丁帆,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新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